



中国共产党 余姚历史

ZHONGGUOGONGCHANDANG YUYAO LISHI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余姚历史

ZHONGGUOCONGMINGYUANJIYAOISHI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余姚历史. 第1卷/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6

ISBN 7—80199—027—7

I . 中… II . 中… III .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余姚市 IV . D23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221 号

书 名：中国共产党余姚历史第一卷

作 者：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责任编辑：贾京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上虞丰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大 32 开

字 数：266 千字

印 张：10.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027—7/K·18

定 价：平装 35.00 元

《中国共产党余姚历史》第一卷

编纂委员会

主任 杨雄跃

副主任 李浙闽

委员 徐小军 蒋狄波 沈相国 毛祥茂
陈小龙 赵永焕 诸伯钧 李臻颖

顾问 章钦 严斌 陆永周 章亦平

编审 章亦平

主编 李臻颖

副主编 黄华振 施松炎

编辑 张杰 李燕萍 杨鹏飞 楼莉波
俞善章 王承环 陆炜炜 韩华军
苏德明 李立春 邹永灿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编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	2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余姚的反响	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	3
第三节 庵东盐民的反公仓斗争	5
第四节 各界声援五卅运动	7
第二章 余姚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11
第一节 坎镇支部和马家路支部的建立	11
第二节 余姚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13
第三节 余姚支部的建立	14
第三章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5
第一节 袭击缉私营	15
第二节 光复余姚	16
第三节 陈云在余姚	17
第四节 城区职工运动	19
第五节 余姚盐民协会的成立	20
第六节 姚北的“吃大户”斗争	22
第四章 大革命在余姚的失败	25

第一编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 — 1927·7)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此爆发。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很快在全国广泛传播,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之后召开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中国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在五四运动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影响下,民主革命思想在余姚广泛传播,抨击时弊、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先后问世;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余姚盐民反公仓斗争震动全国;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坎镇支部在盐场成立;姚北农民“吃大户”、毁教堂引领周边。革命新事物不断出现,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余姚人民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成长。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余姚的反响

1919年5月6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绍兴的第五中学、第五师范、越材中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等校的爱国师生互相联络，决定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2日，杭州14所大中学校的3000多学生在湖滨公园集会，成立了“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在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和省立四中学生在爱国教师的支持下，分别组织了效实学生自助会、殖群社，并发出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和通电。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余姚后，城区及庵东、浒山、马家路、坎镇等地学校师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并分别上街游行。仅保德一乡，就有八九所学校参加，人数多达千余人。师生手执纸旗，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四处张贴标语。沿途群众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数百人自觉加入师生的游行队伍。

五四运动对余姚知识界、思想界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从而一改过去沉闷、死寂的状况，各种新思想、新思潮随之出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他们从研究和宣传民主主义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

余姚一些在外地求学、谋生的进步青年,在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反复比较、推求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英勇地出现在斗争的前列。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纷纷投入新文化运动,参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活动。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的杨贤江^①,不仅亲身参加了游行、集会等学生爱国运动,还写了《新教训》一文发表在《学生杂志》上,对学生运动的意义和教训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他还结交了恽代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郭静唐^②、周伯棣(余姚城郊东泰门外人)也都参加了声援五四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以后,杭一师成了浙江宣传新文化思想的中心,郭静唐、周伯棣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春,他们参加了“一师风潮”等斗争。下半年,他们与同学何晋亮、施存统、梁柏台等同去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赴苏留学受阻,于次年在杨贤江的建议下返校学习。他们的活动虽在外地,但通过书信来往,假期返乡宣传,对余姚知识青年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

1923年,由进步人士韩厥修出资创办的第一张余姚地方报《姚江周报》问世,宣传新思想。是年暑期,余姚部分小学教员参加了在春晖中学举办的教师讲习会,聆听了陈望道、经亨颐等讲演,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

郭静唐在一师毕业后,回余姚在县立高等小学任教,成为宣传

新思想的积极分子，并加入国民党。1924年5月，郭静唐发起集资筹办《余姚评论》旬刊，并任主编。《余姚评论》以抨击时弊为宗旨，“主持正义，辅助弱者”。经常投稿者为上海、宁波以及春晖中学的许多教师和学生，并时常有著名人士的作品刊载。其发行量多达2000余份，发行范围也超出余姚境域。

杨贤江于1920年秋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此前，他已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篇关于青年教育的文章。任编辑后，在商务印书馆与编译所沈雁冰相识，在那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上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使杨贤江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姚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以后曾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并秘密担任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络工作。公开身份除任《学生杂志》编辑以外，还常在一些学校兼课和讲学，不断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先后发表《科学的研究精神和现代思潮》、《列宁与中国青年》和《青年！向哪里走》等文章，并向青年学生推荐《新青年》、《前锋》、《向导》、《觉悟》和《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与此同时，他还十分关心家乡的青年，与韩厥修、郭静唐等关系密切。1924年6月，杨贤江与楼建南（楼适夷）^②等姚籍进步青年在上海组织起“余姚青年协社”。该社以“图谋青年本身利益，以服务社会事业为宗旨”，向家乡青年宣传革命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楼建南接受协社任务返姚，与郭静唐一起创办《余姚青年》半月刊。次年底，“专以抨击姚邑各种设施及揭发社会黑幕为宗旨”的又一刊物《姚江声》创刊。

进步青年胡煌（原籍余姚浒山，今属慈溪），1923年考入上海澄衷中学高中部，开始接受新思想。1926年春，在宁波培英小学任教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在宗汉乡新华小学任教，参加由中共宁波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竺清旦创办的农民业余学校的工作，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

姚籍青年的进步活动和进步报刊的宣传,对马克思主义在余姚的传播和新思想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速了余姚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觉醒,为中共余姚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三节 庵东盐民的反公仓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实际斗争,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8月,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至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军阀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余姚工人农民以很大的影响,以请愿、罢工为主要形式的工农运动也很快在余姚城乡蓬勃开展。

1922年4月,余姚城区铁镬厂工人,7月城区商店的店员职工和竹木业职工相继开展了要求加薪的斗争。

5月,姚北兰塘数千农民开展了反对县政府丈量沙灶地,增加税收的斗争。9月,姚北一带遭受旱灾,加上封建军阀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灾民无法生活。当地土豪劣绅不但不体恤灾民,还请当局派军警防守。17日,忍无可忍的胜山3000余灾民结队向当局提出赈灾的要求,遭到武力威胁。愤怒的农民冲进统捐局,砸烂局内设施,并扣押了一名局员。次日,灾民又成群结队向余姚县城进发,当局一面派军警弹压,一面又不得不拨款2000元,发放粮食救灾,才基本平息了事态。不久,其它乡镇纷纷效仿,风潮一直延续至10月下旬。

1923年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而余姚庵东盐场的盐民斗争却日趋尖锐。1924年7月,盐场万余盐民不满苛政,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全国的罢工斗争。

余姚庵东盐场位于杭州湾南岸,上世纪20年代已有盐民近10

万,年产盐200万担,是浙江最大的盐场,全国三大盐场之一。当地有句民谚:“天下有三苦,晒盐、打铁、磨豆腐”,他们早起鸡啼,晚归星齐,整天挑着百余斤重的咸泥在滩涂上奔跑,劳动强度大,苦不堪言。

盐,很久以来就是统治者的专卖物。历代政府对盐的生产、销售控制极严,巨额的盐税是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又稳定的财源。1913年,在袁世凯卖国政策下,盐税被洋人所控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设立盐务稽核机构,省设分机构,其主管权虽由华人、洋人共掌,但实权落在洋人手里。余姚盐场在庵东设有秤放总局^①,辖6个支局,代表帝国主义银行财团对盐务实行监督,盐场成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封建盐霸向盐民敲骨吸髓之地。

1924年春,盐场当局以杜绝食盐走私为名,建立公仓,将原定盐民5至10天缴盐一次,改为每天收缴,不给现金。每天所晒的盐在家过夜就要罚款。这条苛政更断绝了盐民生计,激起了盐民的公愤。设公仓后,蓬长^②须受公仓监督,也损害了蓬长的利益,遭到蓬长的反对。7月22日,在蓬长的暗中支持下,盐场7个区的盐民代表在庵东万嵩庵开会,通过了反对设置公仓、举行罢工、请愿游行等三项决议。

23日凌晨,盐场各处以鸣锣为号,用围裙作大旗,万余盐民肩背晒牌^③,手执上写“打倒秤放局”、“反对设置公仓”的小旗,集体到盐场公署请愿。场长避而不见,盐民们愤怒地砸掉晒牌并捣毁了秤放总局。秤放总局派来缉私营镇压示威群众,荷枪实弹的税警,竟向手无寸铁的盐民开枪,当场打死5人,伤数人。顿时秩序大乱,被害者家属哀声动地,惨不忍睹。

这一惨案,激起了盐区各界的公愤。整个盐场立即举行总罢工,抗议盐务当局的罪行,千余名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公仓”、“反对苛政”、“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响彻庵东上空。余姚县知事试图平息事态,赶来验尸,被盐民层层包围,后仓皇逃命。

接着,余姚盐场七区盐民团急电全国盐务署、稽核总所、浙江

省政府和两浙盐运使署等,还向县参议会、各机关团体奔走呼吁。宁波、余姚新闻界进步人士仗义执言,公开披露了事件真相,北京《晨报》也报道了这起惨案。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盐务当局只得派员前来调解,处理善后事宜。并作出了设立公仓每天缴盐一案暂时停办、政府对死难盐民发抚恤金每人银洋 600 元、革除秤放局员出入坐轿等恶习、撤职惩办平时欺侮盐民的秤放局员、以后再发现秤放局员刁难和索取盐民按情节予以处分等五项承诺,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余姚盐民反公仓的斗争,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不仅是浙江工人运动复兴的起点,也是全国工人运动从二七罢工之后的低潮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称之为“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之一”^⑦。

第四节 各界声援五卅运动

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唆使打手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 30 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 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 13 人,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这些事件,更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

余姚各界得悉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以后,对帝国主义残害同胞的兽行深为愤慨。6 月 4 日,余姚县立高小由郭静唐等先进分子

发起,召开师生全体会议,在城区内进行游行演讲。当天下午,县立高小等600多师生上街游行示威。5日,县立女子小学等师生也纷纷上街游行演说,在南北两城广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

6月6日,在各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召开了由县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机关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一致作出声援“沪案”,发电北京执政府并上海交涉员,请派使团严重交涉,务达惩凶、偿命、抚恤目的,勿稍退让;通函城乡各校,发动游行演讲;向各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誓不用英日两国货物,坚持到底等五项决议。7日,继续召开会议,通电各团体,宣哥“余姚沪案后援会”成立。制定了募捐措施,决定出版《血海》三日刊。14日,沪案后援会由联席会议改成委员会。全县各地相继成立了“姚江沪案后援会”、“盐场沪案后援会”、“马渚沪案后援会”等组织,在全县迅速开展了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募捐资助上海罢工工人的爱国活动。余姚沪案后援会还成立了英日“仇货”检查团,在火车站、轮船码头等处进行严格检查,没收烧毁英日“仇货”。

6月30日,为进一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行动,根据上海确定的全国大游行日期,余姚沪案后援会发动全县工农商学各界举行大游行,队伍由郭静唐指挥,路经各主要街道,口号不绝,震动全城。

在城区开展声援活动的同时,乡村的活动也如火如荼。泗门、马渚等学校纷纷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慈西丈亭区的祝东、祝西等小学300余人举行了示威抗议游行。祝家渡民众和祝西小学师生组织了救国团,团员臂佩黑纱,手执写有“一致奋斗”、“抵制洋货”、“经济绝交”等口号的白旗上街游行。三七市群众也开展了抵制英日“仇货”的活动。

五卅惨案以后,各界人士义愤填膺,姚邑人士还出现了数次为国殉难事件:6月17日,在上海经商的余姚同乡会会员潘容白,搭“江天”轮由沪返甬,因对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同胞“愤慨已极,决心

为国殉躯”，当晚写下遗书投海自殉；浒山三山小学教员，姚江沪案后援会文牍汪伟铉，闻当局与外交涉停顿，“万念俱灰”，“决拼一死，唤醒国人”，6月27日晚在校门口投池自尽。对潘、汪两人舍生取义的行动，众人都为之惋惜，其反帝爱国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钦佩，激励了群众的反帝斗志。

声援工作历时数月，余姚沪案后援会至11月才告结束。通过这场斗争，又涌现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楼建南、蔡肖鸿、陈公庆、孙鸿湘等又一批旅沪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郭静唐在余姚参加声援五卅运动中，因揭发了余姚教育会会长黄河济贪污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捐款一案，反被黄河济告发为“反对、侮辱联帅，宣传过激思想，拥护广东革命党”，遭县知事奉命通缉。8月下旬郭被迫离姚赴沪，经杨贤江、梅电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的革命活动直接影响着余姚青年的进步和觉醒。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余姚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工农运动多系自发的经济斗争，但无不受到全国工农运动的影响，逐步形成了革命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为余姚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培养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为余姚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至此，余姚创建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注释：

- ① 杨贤江（1895—1931），余姚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长河镇）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因积劳成疾，于1931年8月9日在日本病逝。
- ② 郭静唐（1903—1952），余姚周巷徐家荒场（今慈溪周巷镇）人。是大革命时期余姚革命群众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5年加入中共（后因在租界进行半公开活动，危险性较大，党组织认为还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为好，必要时可列席党团汇报会）。

抗战初期任余姚政工队副队长。1940年8月至1942年6月，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1945年10月随军北撤，1946年6月在山东重新入党。1949年5月任浙江省工矿厅副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工矿厅副厅长、建设厅厅长等职。1952年7月30日在上海病逝。

- ③ 楼适夷（1905—2001），余姚城区高阶沿后街人。1927年2月任中共余姚支部书记，三十年代在上海，为“左联”骨干。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2001年4月20日，在北京逝世。
- ④ 秤放局是封建军阀政府派驻盐场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管理和监督盐场税收的执行情况。
- ⑤ 蓬长是厂商收盐和付款的中间人。
- ⑥ 晒牌是盐场公署发给盐民准许制盐的凭证。
- ⑦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42页。

第二章

余姚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一节 坎镇支部和马家路支部的建立

余姚盐民反公仓斗争后，中共杭州支部了解、发现庵东盐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是宜于开展党的活动的地方。因此，派共产党员岑鹿寿（岑仁明，又名岑民权、韩昌）到盐民运动的发源地余姚盐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岑鹿寿通过关系，以相公殿玉顺廒司事^①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岑鹿寿深入了解盐场和盐民情况，与盐民交朋友，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之后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从此，余姚 10 万盐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迈出了革命的步伐。

1926 年 2 月，岑鹿寿发动盐场 400 多名牛板车工人^②开展要求加薪的斗争，遭到廠商^③的拒绝。于是组织牛板车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廠商提高了食盐的运费，罢工取得了胜利。此后，指导板车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牛板车户公会”。

4 月，中共上海区执委为了广泛开展浙江沿海地区的工农运动，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将余姚、上虞原来为绍属地区的两县列入中共宁波地委的地方工作计划。这样，岑鹿寿与中共宁波地委接上了联系。宁波地委十分重视余姚盐场 10 万盐民的革命斗争，详尽地调查了盐场的历史和现状，以便指导盐场工作。

岑鹿寿在发动盐民的斗争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首先发展了东二区盐民马家生等两入党。5月,余姚第一个基层中共支部——中共坎镇(盐场)支部成立,书记岑鹿寿,支部办公驻地相公殿,隶属宁波地委领导。中共坎镇支部是余姚第一个农村支部,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7月,支部划归中共上海区执委领导。以后,又发展了东一区小学教员顾小轩等积极分子入党,支部计有党员8人,活动范围主要在盐区。

在岑鹿寿筹建坎镇支部的过程中,1925年从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师范研究科毕业,回乡任教的柯东乡青年施若愚,曾多次与岑鹿寿和同学孙鸿湘(共青团宁波地委工作,后调上海团中央)接触联系,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党的教育。根据当时在知识青年中发展革命力量的一般做法,首先把他们吸收到国民党组织中来。1926年春节,通过孙鸿湘的介绍,施若愚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先后发展教师黄月樵、杜竹如为国民党员。4月,施若愚参加了中共宁波地委召开的有关开展农民运动的会议,会议要求把从百官到观海卫一带姚北、慈北的农民全部组织起来,特别要求余姚首先从宗汉、永凝两地开始,再扩大影响。此后,施若愚利用假日下乡,深入农村秘密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宣传范围西至历山,东至道路头,北到坎墩相公殿,纵横数十里。暑期,施若愚等全力投入了柯东乡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7月,他们在柯东乡庙山墩眉山庙召开了农民大会,到会农民500余人,会后陆续登记加入协会。9月,柯东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有会员50余人,马元卿为协会负责人,办事处驻地马家路后街。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减租减息等活动。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经上海区执委、宁波地委专人考察,施若愚、黄月樵由孙鸿湘介绍,在8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宁波地委指导,施若愚为联络通讯员。9月,又发展教员马钟秀(马育儒)入党,成立了中共马家路支部(姚北支部),施若愚任书记。10月,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执委领导。以后,施若愚因身份暴露,被浒山警察所注目,与胡煌等一起离姚去沪,支部由黄月樵负责。次年3月,黄月樵任书记,以后组织不断扩大,党员发展到30多人。